

## 简论《圣经》“四人小组”译本

刘念业

**提 要：**《圣经》汉译是继佛经中译之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件大事。对这一事业，近代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贡献较为突出，推出了种类繁多的各式《圣经》汉译本。1838 年出版的“四人小组”译本在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上对《圣经》汉译事业均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深刻影响了后来著名的“委办本”和“和合本”。但因各种历史因素，宗教界和学术界对此译本多语焉不详，本文试图通过对该译本多方面的探讨还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刘念业，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四川外语学院英语学院讲师。

主题词：《圣经》汉译 传教士 “四人小组”译本 翻译原则 翻译模式

### 引 言

《圣经》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译介无疑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大意义。19 世纪早期，《圣经》完整地传入中国可谓世界《圣经》翻译史上的大事，但若从唐代景教徒的翻译算起，《圣经》汉译至今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著名的唐代景教碑文表明，聂斯脱利派的传教士已有能力将基督教书籍译为中文<sup>①</sup>。元代可能也没有留下什么《圣经》中译作品。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传教一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传教士也开始尝试《圣经》中译，但多为片段翻译，未能推出完整的《圣经》中译本。主要原因在于天主教为达到垄断教义和民众信仰生活的目的而强硬维护拉丁文《圣经》的地位，禁止随意把《圣经》翻译成各国文字。但随着 1517 年马丁路德揭橥改教运动并以德文翻译《圣经》，各国教会开始翻译本国语言《圣经》以脱离天主教拉丁文《圣经》的桎梏，罗马天主教会教义和信仰生活的垄断逐渐被打破，信徒开始可以免费阅读《圣经》，并以《圣经》为信仰与生活唯一准则。基督新教入华后的《圣经》翻译事业就根源于此。另外，17 至 18 世纪发生在欧美的“福音奋兴运动”（Evangelical Revival）宗教热潮和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力地促进了近代新教传教事业的兴起，而发生在中国的传教运动直接引发了新教入华后长达百余年的《圣经》汉译事业。

### 一、译本之缘起

1807 年英国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到达广

州，开启了新教在中国的传播。来到中国后，马礼逊并没有急于直接向中国人传教布道，而是首先学习汉语，着手进行《圣经》的翻译工作。在另一位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的协助下，马礼逊于 1820 年完成了中国境内首个汉语《圣经》全译本，但是译本质量远非完美。马礼逊意识到修订工作的重要性，曾计划和米怜合作进行修订工作，但米怜的早逝阻碍了修订计划。后来，马礼逊尝试独自进行修订工作，于 1830 年推出了修订后的汉语《圣经》。然而，这部“新”的汉语《圣经》实际上和老译本区别不大，除了少量措词的修改，主要是修正了老译本所存在的印刷错误<sup>②</sup>。马礼逊本人对此十分清楚，去世前他曾致函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希望该会能够资助其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全面修订《圣经》译本<sup>③</sup>。不过，马儒翰较其父亲更热衷于世俗事务，没有成为传教士。1834 年其父去世后，他继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中文秘书兼翻译官，已无暇完成其父遗命。

马礼逊于 1834 年 8 月在华去世。他的逝世对新教在华传教事业可谓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对汉语《圣经》的修订工作却有着积极的意义。马礼逊活着时，其在欧美传教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其“光辉”形象反而构成了其他传教士修订其《圣经》译本的障碍，原因有二。第一，马礼逊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与英美各圣经公会建立了极其密切和友好的关系。在马礼逊活着的时候，没有其首肯，这些重要的资助机构不太可能资助其他传教士全面修订他的译本。第二，鉴于马礼逊的威望，作为其后辈和学生的新传教士很难对其译本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自然也谈不上全面修订其译本。实际上，尽管

全面修订马礼逊译本的愿望在马礼逊去世前很多年就已经萌发,但不论是新来的传教士还是欧美各传教差会和圣经公会都还是把修订工作的希望寄托在马礼逊的身上。例如,马礼逊曾比较欣赏另一位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的中文造诣,希望他尝试重新翻译一部新的《圣经》。但麦都思推辞了,因为那时他对自己的汉语能力尚不够自信,并且认为只要马礼逊活着,不论是修订还是重新翻译,马礼逊仍是最适合的不二人选<sup>④</sup>。然而,马礼逊已年老多病,精力不济,再加上其担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的中文秘书和翻译,其对修订工作已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而随着其去世,新的《圣经》译者开始展露头角。

## 二、新译者的涌现

伴随着新教传教事业在中国的缓慢兴起,更多的传教士相继从欧洲和美国抵达中国。在实际传教过程中,通过和中国人的接触,一些传教士逐渐意识到马礼逊译本所存在的问题,重新修订或推出新的译本已成客观需要。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积累,他们也逐渐拥有了修订老译本的信心和能力,从而使新译本的出现主观上也具备了可能性。

首先发起修订计划的是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麦都思。他曾在马六甲一带的华人社区协助米怜开展传教工作,并成为米怜最重要的助手,后者也成为他“学习中国语言和增强神学知识”的老师<sup>⑤</sup>。1834年,马礼逊去世后,伦敦传道会在中国本土已无传教士。在这种情况下,麦都思于1835年7月21日来到广州。这时,他已成为伦敦传道会在中国本土的唯一传教士,在对华传教方面实际上已取代了马礼逊的地位。到达广州后,麦都思立即联络当时也在广州的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组建了一个“四人翻译委员会”以商讨修订老译本的计划。

郭士立系德国传教士,属荷兰传道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1827年到达雅加达华人社区传教,并在那里结识了麦都思,交往十分密切,后者也成为他的中文启蒙老师。1828年,郭士立与荷兰传道会就传教产生分歧,对荷兰传道会种种束缚感到厌烦的郭士立认为“荷兰传道会在中国传教事业上的懦弱无力”,决定与荷兰传道会断绝关系,成为一名独立的传教士<sup>⑥</sup>。裨治文系美国传教士,1829年被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按立为传教士,并在该年被派往中国传教,成为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开端。到广州后,马礼逊给予了裨治文各方面的帮助,尤

其在中国语言文化学习方面。马礼逊不仅帮助他聘请中文教师还为他准备中文学习资料,包括《华英词典》、《广东省土话字汇》、中文《圣经》等<sup>⑦</sup>。裨治文很清楚掌握中文对未来传教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中文学习上,因为“将来散发宗教书籍、手册以及与人交谈等,都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熟练使用中文,只有学好了中文,才能有所作为”<sup>⑧</sup>。马儒翰是马礼逊的长子,出生于澳门,自幼学习中文,谙熟中国语言文字和社会风情。

随着老一代传教士米怜和马礼逊的逝世,新一代的传教士逐渐接替了他们在华传教各领域的工作,其中就包括《圣经》汉译的工作,逐渐形成了新的译者群体。在日常传教实践中,他们时常体会到马氏《圣经》译本所存在的问题,逐渐萌发了对汉语《圣经》进行修订或重新翻译的想法。

## 三、“四人小组”译本翻译始末

马礼逊去世后,麦都思成为在华资格最老的传教士。他已经不再局限于对马氏译本的修订工作,而是大胆提出了新译本的计划。1835年7月他来到广州,联合郭士立、裨治文和马儒翰组成了一个“四人翻译委员会”共同进行翻译工作。翻译工作进展很快,1835年底新约的翻译就基本完成,1836年由麦都思做了最后一次的订正,1837年便在雅加达出版了,定名为《新遗诏书》,共计325页,旧约于1838年在新加坡出版发行,定名为《旧遗诏书》,计有665页<sup>⑨</sup>。宗教界多称之为“四人小组”译本。

翻译速度之所以如此迅速其实与麦都思早期的翻译工作密不可分。早在1826年,他就曾把自己对马礼逊译本《马太福音》前五章的修订样本寄给马礼逊,供马礼逊参考。之后,麦都思一直在断断续续地从事《圣经》翻译工作,但碍于马礼逊活着时的巨大声誉,麦都思没有公开自己的翻译工作。实际上,新约的翻译工作主要是由麦都思一人独自进行的,旧约则主要是由郭士立独立完成,也有麦都思,裨治文和马儒翰的帮助。裨治文后来在谈及此译本时只是说“麦都思博士和其他人的新约”<sup>⑩</sup>,丝毫没提到自己的参与。马儒翰在1837年给伦敦传道会的信函中表示自己只是“新译本的副手”,负责评阅其他人的译文<sup>⑪</sup>。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1835年在给美部会的报告中也未提到裨治文和马儒翰的翻译角色,只是说:“修订(马礼逊的译本)工作进行的相当快,麦都思和郭士立几乎不间断地从事这项工作”<sup>⑫</sup>。

总的来说,裨治文和马儒翰在这部新译本的作用并不显著,主要是进行一些评阅工作,然而他们的参与却

有另外的意义。裨治文虽然没从事具体的翻译工作，但他的加入使得新译本具有了跨宗派和跨国籍的背景，而马儒翰作为马礼逊的儿子，他的加入从某种程度上给人一种印象，新译本并不是要全面否定老译本。麦都思费尽心机组织这样一个“四人翻译委员会”，其目的无非是想减轻欧美宗教界对新译本的抵触，从而获得广泛的认同和相关机构的赞助。

#### 四、新的翻译原则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圣经》翻译，直译和意译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早期的《圣经》译者大都主张直译，近当代的翻译家则较为灵活，认为有时为了达到“忠实”反而需要在译文文体和形式上做出某种变通。但总的来看，在西方基督教国家，《圣经》始终被视为基督教的经典，其宗教性被认为是第一性的，这种认知传统基本上决定了西方译者的《圣经》翻译观，即严格“忠实”于《圣经》所包含的信息作为翻译的首要原则不可动摇，讨论的分歧只是在于如何达到“忠实”，可以说是目的相同，手段各异。

作为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个完整《圣经》汉译本，马礼逊译本的主要问题是固执地最求忠实而不地道，异域色彩浓厚，晦涩难懂，被认为是硬译或死译。马礼逊在谈到其《圣经》翻译的原则时曾说过：“在我的译本中，我力求忠实，明达和简易。我宁愿采用常见字而舍弃罕见的经典字，努力避免使用异教哲理和遗教典籍中的术语”<sup>③</sup>。比较而言，“四人小组”译本采取了更为灵活的翻译原则。麦都思发现汉语和西方语言在语法、习惯用语和词汇构成等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既要忠实又要地道地翻译经文是非常困难的。“过于直译并不一定意味忠实，因为中国人不能完全理解译文，甚至产生错误的理解，中译本应该采用汉语习惯用语，避免希伯来风格”<sup>④</sup>。麦都思还认为新译本仅仅只是向中译最终版本的方向迈出了几步。“毕竟，最好的译本是由当地人所译的；当我们遇到一位学识渊博又尽职的中国人，让他在自己语言的基础之上深读并熟悉《圣经》原本，他就能创造出一种翻译，在它面前我们所有的最好的翻译都必须让步”<sup>⑤</sup>。可以说，在基督教新教的《圣经》汉译事业上，麦都思第一次建立了这样的观念，即《圣经》的翻译不是拘泥在源语的文字上，而是取决于它在译语文化中的意义。现就《约翰福音》第一章举例说明：第1节“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四人小组”译本译为“元始已有道其道与上帝永在道者即上帝也”<sup>⑥</sup>。马礼逊译为“当始已有言而其言偕神又其言为神”<sup>⑦</sup>。第5节“The light shines in the darkness, and the darkness did

not overcome it.”“四人小组”译本译为“夫光辉耀于暗而居于暗者弗识之矣”<sup>⑧</sup>。而马礼逊译为“夫光辉耀于暗而暗弗认之矣”<sup>⑨</sup>。第16节“From his fullness we have all received, grace upon grace.”“四人小组”译本译为“由其盛德吾咸受恩典矣”<sup>⑩</sup>。马礼逊译为“由其之满我众受宠于宠焉”<sup>⑪</sup>。第23节“He said, ‘I am the voice of one crying out in the wilderness, make straight the way of the lord,’ as the prophet Isaiah said.”“四人小组”译本译为“古圣人以赛亚预言曰野外有声呼云修直主路者此声正乃我也”<sup>⑫</sup>。马礼逊译为“曰我乃呼于野者之声云正修主途也如先知以赛亚云焉”<sup>⑬</sup>。

在译文中，“The Word”和“with God”被马礼逊直译为“言”和“偕神”，而“四人小组”译本则意译为“道”和“与上帝永在”。第五节的第二个“darkness”被马礼逊直译为“暗”，而“四人小组”译本意译为“居于暗者”。第六节的“Fullness”被马礼逊译直译为“满”，“四人小组”译本意译为“盛德”，“grace upon grace”被马礼逊译为“宠于宠”，“四人小组”译本则为“恩典”。第二十三节中，“四人小组”译本把“the prophet Isaiah said”翻译成“古圣人以赛亚预言”，并改变语序置于句首，马礼逊仍然选择了直译，对语序未做丝毫改动。对比两个译本，可以看出，“四人小组”译本的翻译质量超越了马礼逊译本，意译的翻译原则被麦都思首次引入到《圣经》的中文翻译中。应该说，麦都思的建议是十分超前的，甚至对《圣经》英译来说都同样如此，这一点直到1970年新英文《圣经》的出版才得到认可。而1611年钦定本及1885年的修订本，据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尽可能地对原语的语言特征，如字的顺序、句子的结构和分层，甚至是不规则的语法都进行了忠实的翻译”<sup>⑭</sup>。

除了直译和意译的问题外，麦都思在新译本中还触及到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God”的译名。不同于马礼逊“神”的译法，麦都思采用了“上帝”的译名，而用“神”取代马氏译本的“风”来翻译“Spirit”。麦都思认为，“上帝”的译名是在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中经常使用的，被中国人赋予了最高的地位，而“神”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从未被认为是最高的存在<sup>⑮</sup>。“四人小组”译本的这一翻译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引发了19世纪中后期新教传教士围绕“神”和“上帝”两种译名所发生的大争论，即历史上有名的“译名之争”，最终导致了“神”版和“上帝”版两个版本的汉语《圣经》。

#### 五、译本之接受

麦都思很早就注意到“四人小组”译本可能会引发的争议。麦氏意识到单枪匹马翻译新译本可能很难获得

广泛的认同和资助,所以 1835 年来到广州后,他便组织了一个“四人翻译委员会”共同参与新译本的翻译工作,尽管实际上参与翻译的主要是他自己和郭士立。

为了获得英国圣经公会对“四人小组”译本的支持,麦都思于 1836 年底不惜亲自回到伦敦进行游说工作,并向英国圣经公会提交了一份名为《就中文〈圣经〉新译本给英国圣经公会的建议》(Memorial Addressed to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on a New Vers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s)的长篇文章。在文中,麦都思首先歌颂了马礼逊在《圣经》中译事业上的开山之功,但接着便对马礼逊译本进行了大胆的批评,为其推出新译本提供依据。麦都思在文中还详细讨论了汉语的文体特征和新译本所采取的翻译原则。最后,麦都思还详细附录了马氏译本在具体翻译中所出现的部分“错误”和新译本所做的修订。

麦都思在《建议》中还提到了其他传教士对“四人小组”译本的支持。为了获得英国圣经公会的支持,他声称当时在马六甲华人社区传教的伦敦会传教士台约尔(Samuel Dyer, 1804—1843)和伊万斯(John Evans, 1801—1840)“完全赞同新译本所采纳的文体”。但出乎麦都思意料的是,此二人在收到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稿本之后,立即于 1836 年 4 月 25 日致函给郭士立,反对出版这部《圣经》,理由如下:第一,许多已经完成的译文都没有经过充分的整理;以及第二,译本采用的正典原文显得极其马虎<sup>⑤</sup>。两日之后他们又致函英国圣经公会,强烈劝告不要出版这部新约译本<sup>⑥</sup>。而麦都思当时还在回英国的船上,对这些信函毫不知情。可以想象,两位传教士对新译本公开的否定态度会令回到伦敦的麦都思陷入何种尴尬的境地。1836 年 11 月 25 日,英国圣经公会的编辑小组委员会做出了相关决议:

1. 本小组委员会反对这部新汉语《圣经》译本的作者所采用的翻译原则:因为它倾向以凡人的释义代替“God”话语的简单陈述。2. 本小组委员会建议现在继续使用马礼逊博士的译本。3. 按着本委员会与伦敦传道会董事会在若干场合中已经彼此接受和实行的原则,谄慰后者采取必须的步骤,完成修订马礼逊博士的译作,而这似乎是博士自己曾经思忖过的;按照上述理解,以此方式修订的译本,并经他们详鉴,则此后一切合理开支均将由本委员会支付。4. 不论新译本有多少册是已经在本会资助下印刷完成的,一律限制流传出去<sup>⑦</sup>。

麦都思希望得到英国圣经公会支持的努力失败了。英国圣经公会给出的原因是无法接受新译本的翻译原则。根绝这一新原则,一段翻译的经文不应该只是由是否严格忠实于经文原文而决定的,而是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译文语言、来源语言和读者的文化语境。当时的圣经

公会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认识,仍然强烈相信《圣经》的语言是逐字逐句不可改变的。另外,台约尔和伊云士的批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实际上这只是“四人小组”译本不被接受的原因之一。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马礼逊译本仍然拥有高度的威望。1843 年 3 月 1 日英国圣经公会的编辑书记乔伊特致函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揭示了某些背后的原因:“我们发现,鉴于麦都思先生的主张和解释,如此广泛地谴责马礼逊博士(一个在民间和传教界均享有最崇高荣誉的人)所造成的影响,而且他自己的译文风格给我们的印象是相当草率和大胆的,让我们难免对承诺支持新的译经者感到忧虑”<sup>⑧</sup>。自从马礼逊来华传教,英国圣经公会一直坚定而慷慨地支持马礼逊的译经工作,并和马礼逊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很显然,对于麦都思对马礼逊译本的大胆批评,英国圣经公会是无法短时间接受的。

麦都思对英国圣经公会的决定十分愤怒和沮丧。在他 1839 年出版的《中国的现状和传教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一书中,他把“四人小组”译本“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没能得到相关人士的合作和支持。麦都思在这里实际上是在暗暗地批评台约尔和伊云士等人的拆台。虽然没能得到伦敦传道会和英国圣经公会的支持,但就实际效果而言,“四人小组”译本在中国基督徒中仍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因实际需要,当时来华的各国传教团体还是认识到了该译本的优点,出资印刷出版了这部《圣经》以供传教之需。在“委办本”《圣经》问世之前的十几年间,该译本一直为在华传教的新教传教士所使用<sup>⑨</sup>。还值得指出的是,该译本后来为太平天国所采用,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 结 语

“四人小组”译本在欧美传教界没有获得相应的认可,以至每每论及,语焉不详。而实际上,该译本的翻译原则,“翻译委员会”模式,以及它和圣经公会复杂的关系都对之后的基督教《圣经》汉译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译本没能获得应该享有的认同,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新教在华传教工作的奠基者马礼逊的崇高地位,即便是在其逝世之后,其影响仍然深远。新译本被拒绝的第二个原因是翻译原则的不被认可。新译本可以说是运用了带有现代色彩的翻译原则。当时的圣经公会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认识,仍然强烈相信上帝的语言是逐字逐句不可改变的。因此,新译本不被当时欧美传教界接纳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该译本带来的另一个深远的影响,就是“翻译委员会”模式的出现。作为新教《圣经》中译事业的首个

“翻译委员会”，此次由麦都思组织的“四人翻译委员会”标志着《圣经》中译活动开始由个人翻译走向联合翻译。此后，《圣经》中译本为了获得在华传教士和圣经公会的广泛认可，在一个翻译委员会领导下的联合翻译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另外，圣经公会对一部《圣经》译本能否持续成功的决定性地位通过这次的《圣经》翻译活动已经逐步确立起来。在马礼逊时代，圣经公会只是作为译者背后的资助者，并不能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和译本的翻译原则。然而，此次译经活动后，传教士译者新推出的《圣经》汉译本为获成功，得到至少一个圣经公会的认可和支持已不可或缺。圣经公会不再仅仅是一个资助机构，还变成了一个决策机构，其对译本的认可与否往往直接决定了一个译本的生存<sup>⑩</sup>。在之后的“委办本”《圣经》和“译名之争”中，其权威地位表现的淋漓尽致。

“四人小组”译本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失败了，但麦都思等人并没有放弃修订汉语《圣经》。几年之后，麦都思联合上海、广州、宁波、厦门、福建和香港地区的传教士译者翻译了著名的“委半本”汉语《圣经》。

（责任编辑：甘棠）

①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London: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1934, p. 20.

② W. H. Medhurst, *Memorial addressed to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on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s*, London: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836, p. 4.

③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Annual Report*, London: The Philanthropic Society, 1835, p. LXXX.

④ W. H. Medhurst, *Memorial addressed to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on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s*, p. 3.

⑤ W. H. Medhurst, *Memorial addressed to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on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s*, p. 1.

⑥ Suzanne Wilson Barn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65.

⑦ Bridgman, Eliza J.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 to China, The Life and Labor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 A. D. F. Randolph, 1864, p. 40.

⑧ Bridgman to Anderson, Canton, April 16, 1830,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reel 233.

⑨ 诚质怡：《圣经之中文译本》，收入贾保罗编《圣经汉译论文集》，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5，第7页。

⑩ Chinese Repository, 1846, p. 108.

⑪ 蔡锦图译，尤思德著：《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第49页。

⑫ F. W.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 Williams*, New York: The Quickerbocher Press, 1889, p. 75.

⑬ E.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2 Londo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39, p. 9.

⑭ W. H. Medhurst, *Memorial addressed to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on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s*, p. 10.

⑮ W. H. Medhurst, *Memorial addressed to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on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s*, p. 11.

⑯ 麦都思等译：《新遗诏圣书·约翰传福音书》，新加坡：坚夏书院，1839，第1页

⑰ 马礼逊译：《神天圣书·圣若翰传福音之书》，马六甲：英华书院，1827，第1页。

⑱ 麦都思等译：《新遗诏圣书·约翰传福音书》，第1页。

⑲ 马礼逊译：《神天圣书·圣若翰传福音之书》，第1页。

⑳ 麦都思等译：《新遗诏圣书·约翰传福音书》，第2页。

㉑ 马礼逊译：《神天圣书·圣若翰传福音之书》，第2页。

㉒ 麦都思等译：《新遗诏圣书·约翰传福音书》，第3页。

㉓ 马礼逊译：《神天圣书·圣若翰传福音之书》，第3页。

㉔ Jack P. Lewis, *The English Bible*,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91, p. 132.

㉕ W. H. Medhurst, p. 11.

㉖ Copy of a Letter from the Rev. Messrs. Evans and Dyer to the Rev. Charles Gutzlaff, April 25, 1836, 见伊文思和台约尔给郭士立信件复本，包括在《关于提出新的圣经中文译本的议案的相关档案》(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Proposed New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s) 中，英国圣经公会存。

㉗ Copy of a Letter from the Rev. Messrs. Evans and Dyer to the Rev. Joseph Jowett, April 27, 1836, 见台约尔和伊云士致英国圣经公会的信件复本，包括在《关于提出新的圣经中文译本的议案的相关档案》中，英国圣经公会存。

㉘ Resolutions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on the Proceeding papers, Extracted form the Minutes of Editorial Sub-Committee, December 5, 1836.

㉙ 转引自尤思德：《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第56页。

㉚ Richard Lovett, *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795 — 1895, London: H. Frowde, 1899, p. 512; 也可参见诚质怡，《圣经之中文译本》，“在以后的十或十二年中，耶稣教教会都以这册为主要的圣经译本”，收入贾保罗编《圣经汉译论文集》，第7页。

㉛ 蔡锦图译，尤思德著：《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第65页。